

新民說

秩序与历史

刘仲敬 | 著

从华夏到中国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国家与文化安全治理丛书

刘仲敬 | 著

从华夏到中国

Cong Huaxia Dao Zhongguo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华夏到中华 / 刘博敏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495-5715-8

I. ①从…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 IV. 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753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62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2 字数: 300千字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册 定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文化国家与文化安全治理丛书》学术委员会

主 任：但彦铮 刘跃进

副主任：刘仲敬 董彦斌

委 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龙大轩 任惠华 刘仲敬 刘跃进 但彦铮

张永和 林国华 林国荣 郑文龙 郑晓均

黄顺康 黄清洁 董彦斌

《文化国家与文化安全治理丛书》编委会

主 任：但彦铮

副主任：郑晓均

委 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玉宝 任惠华 肖 毅 何志辉 但彦铮

林国华 林国荣 郑文龙 郑晓均 胡尔贵

赵新立 黄清洁 董彦斌

本丛书系文化国家与文化安全治理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



本丛书不仅包括一般的社会安全治理，
还包括非传统领域的文化安全治理，
意在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进步。



本丛书由西南政法大学安全治理与社会秩序维护研究院、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
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负责出版
及作者权益保障。



本丛书设立学术委员会，
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力求保证学术品质。

秩序之流，混沌之海

文明何物？秩序出于混沌也。混沌大而秩序小，混沌久而秩序短。故文明者，选择、刊落也。譬如认知图景，非出于眼而出于脑。感官之所入，纷繁迷离而不能成像。灵明之所择，仅在先定之若干认知框架。框架之外视若无睹，犹紫外线、超声波之属。然其异者在于：非五官所不能，实心智所不欲。文明亦然。有形态意义出于无形态质料，犹巨匠之凿石留像。意义有异、宗风各别，然石多像少，一也。石固可无像，像不可无石。混沌固可无秩序，秩序不可无混沌。文明秩序生于混沌，亡于混沌。文明在世之日，亦须时刻自“混沌汪洋”抽取“秩序之流”以维持自身。

历史何物？伏脉隐于苍莽也。“秩序之流”在，则意义在；意义在，则历史在。循流溯源谓之史。意义世界之前、之后、之外，有事件而无历史。天下无不死之人，亦无不亡之史。有大河，而后有星宿、积石。河竭，星宿、积石无异于邻村池塘、土堆。黑斯廷斯、兰尼米德尚有意义，以其后裔未绝、江河浩荡之故。否则，事件丧失意义，后人只知其为权力与财富之争。帝国

早期史家尚知恺撒、庞培龙争虎斗，乃共和、城邦之生死抉择；拜占庭晚期史家则视同列朝诸帝争位。历史丧失意义与文明衰亡过程同步，昭然若揭。权力与财富之争无所不在，邻村村长子侄早已充分表演，在吾耳目，何需远求？故不知秩序脉络而辑录事件，非史也，博古集邮学也。

文明何益？赋予生存以意义也。历史何益？发掘维持意义世界也。原人栖栖遑遑为野味，史前之人也。孔子栖栖遑遑为礼乐，历史之人也。范进栖栖遑遑为科第，史后之人也。史前之人不知意义世界。史后之人有先人所遗之意义世界，然而无法理解。愚夫愚妇皆知克伦威尔篡位不同于亨利四世篡位，证明史家已尽其维护文明责任。愚夫愚妇皆知刘邦、项羽争位等于朱元璋、张士诚争位，证明史家已尽其消耗文明责任。文明将衰而未亡，则史家相率抛弃意义维持而逃于材料编列，甚至以理性客观中立专业自诩。文明将兴或复兴，以史家能就同样材料创造或重建意义体系为先兆。观诸轴心时代及近世欧洲，可见风会所至、百无一失。王船山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垂老文明渴望以刷新意义世界而自救也。苟能明此，纵然知其不可为，亦当有所必为，以待来者。

是为序，填词志之。

水龙吟·岐下

铜螽何处斜阳，鸾韶久闭行云度。
紫陌题镌，风遊雨嬉，空阶数处。
过眼苍莽，蓼落秋姿，曾堪一顾。
甚梅枝解舞，披芳弄焮，霜天老，鹭影孤。

一笑依约解语，忆三生，迢递青芜。
结庐人杳，残英遗瑟，家山无据。
陇坂西风，长杨蒺藜，碧鸡难度。
任驿庭新月，宵深犹过，当年骏骨。

假如种子不死

T.S.艾略特的意见大致是：著作的意义与作者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著作依托的传统。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的事情。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只有传统的颠覆才是终极而不可逆的裁决。普希金曾经扬言，他要让刽子手的子孙为他诅咒自己的祖先；但东正教-神圣俄罗斯-家长君主制的三位一体传统虽然没有阿克萨科夫和舍维廖夫期待的那样强大，倒也并不像普希金和拉吉舍夫想象的那样脆弱。今天，普希金的精神子孙和舍维廖夫的精神子孙仍然在索布恰克和普京身边播种。俄罗斯的辽阔原野和亿兆子民无异于诸神的竞技场和原料库。普希金所预见的那种可怕裁决只发生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例如，希特勒精神和政治上的子孙用他们继承的遗产杀害自己的祖先，将诅咒传扬到万国和后世。有些人之所以对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日本的种子没有死亡，人为的严冬早晚会过去；一个骄傲的民族终将卷土重来，将地方性战争的是非成败投入资料杂物室。

在华夏世界的天空下，诸神的战争围绕“正闰之辩”展开。

“正统”和“闰统”之于儒家文明的习惯法体系，犹如“宪制”和“僭政”之于日耳曼习惯法。习惯法的力量总是大于任何成文法，却不会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儒生的“正闰之辩”就发挥了相当于英格兰王国上议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们要通过“众议金同”裁决：什么是权利（right），什么是权宜（necessary），什么是僭越（self-assumed）。前两者属于“正统”，后者属于“闰统”。在“正统”边界内，还存在“经权之辩”。“经”类似权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绝对合宪性。“权”类似权宜（necessary），允许——但仅仅为合宪的目的而允许——行使紧急状态权力。研究和鉴定“正、闰、经、权”的学问，就叫“经学”。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其实不然，两者的差别像爱德华·科克与戈登·伍德、施米特与兰克一样大。当然，许多重量级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谟和麦考莱的所谓史学，其实主要是经学。他们的著作与其说与世无争地考证历史，不如说积极主动地加入了作者同时代的宪法斗争。我们必须对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给予同样的评价，但钱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在华夏传统中，经学的极端派称为“公羊学”。王莽和康有为就是这一派的知名人士。他们勇敢地主张：如果有利于教育君主和国民，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并非不正当。他们如果了解西学，大概会从来库古和努马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然而，这不是经学的主流。正统派通常坚持：在毫无目的的考证和毫无依据的政论之间，审慎地寻找最佳平衡点。审慎是政治德性当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此经学就是所有学问当中危险最大的一种。看上去似乎毫无技术含量，但这正是经学最危险的地方。汉景帝之所以叫停关于汤武的争论，理由就在这里。“为什么承认秦始皇的正统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准则？”“为什么否定唐太宗的权宜必要性，可能损害君主维

护良治的积极性？”这样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比较轻浮的杂文家大概会嘲笑这些无事生非的折腾，但这种表现仅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产物。英格兰王国的牧师和律师难道真会认为，王位继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对他们都一样？法利赛人难道真会认为，犹太人用什么方式遵守安息日对他们都一样？如果负有维护正统责任的特殊阶级（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此）如此缺乏远见和责任感，那么共同体和他们自己的毁灭就会比最悲观的预言还要迅速。

笔者如果不是在《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到过王国维和周作人对叶德辉之死的不同反应。周作人其实和王国维一样身在局中，无由置身事外，但他没有运用智力反而更好，从而便不会为自己营造出身在局外的幻觉。他不愿面对事实：党军是否打算害谁并不重要，因为党军出现的事实本身就是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他以为，如果能科学地证明老鼠并不咬人，怕老鼠的懦夫都是傻瓜，他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淹死。然而，自欺欺人只会将他引向更少尊严的死亡。人类没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却逃脱不了违背法则的代价。精明的赌徒过高估计个人的智慧，通常会比愚夫愚妇死得更惨。司马迁为此发明了一种十足经学的辞令：“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撇开一神教传统和世俗人文主义传统的差异，这话的意义就相当于犹太人所谓“敬畏神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后看到智者教育儿童不用害怕，最后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你会不会急于研究老鼠的生物学特征，或是急于联络爱猫人士捉老鼠？实际上，你最应该做一件事：将最宝贵的信息装进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来的事情，不再与你有关。“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种子也许落入石田，也许落入沃土。”如是而已。

什么是民国？它不是一些事件，甚至不是一条道路，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也许有许多条路，也许一条路也没有，也许有高速列车接送，也许必须自己开路。地图是重要的，但不会比方向更为重要。道路决定命运，但方向决定了道路的命运。方向是价值决断的产物，超乎实证知识的层面。价值源于产生你的传统和你选择的传统，是一切论证的起点而非结论。如果你决定去更加温暖的地方，你就要选择去广州的马车，而拒绝去北京的飞机。如果有人说他飞机比你的马车先进，他的飞行员比你的马车夫高明，以及多少人在路上淹死，多少人在终点喂了鲨鱼，这时，你没有必要费心争论，要像水手对待飓风一样承受必要的代价。如果你想欺骗自己的同伴，用道路的优劣偷换方向的选择，你将在为时太晚的时候发现，你的聪明不足以代替法则保护你。

什么是法统？它不是宪法的形式和权力的分配，而是一种必须建立和巩固的神秘信任，以及一种鉴定“正、闰、经、权”的价值选择。只要后两者存在，任何形式的宪法和权力都能稳固。反之亦然。如果华夏可能变形为民国，正统就必须变形为法统。法统失败，就是民国失败。权力斗争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胜利的最佳证明；而权力斗争不再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失败的最佳证明。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斗争必须以儒家道义为借口，甚至必须为此牺牲和掩饰原有的白莲教信仰，这就是儒家正统的胜利。如果朱元璋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布白莲教的胜利，或是宣称朝廷理应依靠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统治，那就意味着无论儒家正统是否应该灭亡，事实上已经灭亡。如果詹姆斯国王和科克爵士都自称英格兰古老法律的化身，那么法统和英格兰王国就已经胜利了，而君主和国会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如果段祺瑞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都自称废除法统的革命政府，那么法统和民国就已经失败了，而南北双方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借口与权力斗争的关系无异于婚

姻神圣和肉欲享受的关系。以肉体欲望否定婚姻誓言和社会基石的神圣性，在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都是极其幼稚的。不宁唯是，这种论证是价值虚无主义入侵存在之家的明确征兆。价值虚无主义的源头并非难以判断，我们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后者特别希望证明：一切男女关系本质上都是肉体关系，因此婚姻、通奸和强奸没有本质区别；一切统治本质上都是暴力关系，因此法统、僭政和无政府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论证的下一步就是：强奸犯是诚实的，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享乐付出牺牲；丈夫是卑鄙的，因为他借助虚伪的形式骗取免费的福利。这些论证是超乎正确或错误之外的，因为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确征兆。只要走到这一步，任何论证都已经丧失意义。

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的可怕在于国王和王后变成了可以砍头的男男女女，因为君统的神圣性乃君主国存亡的关键。法律是共和国的母亲，因为法统的神圣性乃共和国存亡的关键。所谓神圣性，就是信任出于敬畏而非理性。共同体受制于群众想象力的弱点，甚于智者理性的巅峰。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

“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法统的灭亡和动物化生存，乃同一客体的两种不同修辞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虚荣而非敬畏为出发点，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认你对

自己做了些什么。相反，你将同时提出两种不大可能全都正确的论证：南方其实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法律形式不难转变为另一种，但前提是法统仍然存在。法统灭亡以后，社会不是改变了某种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为无形态战争。社会性超限战的习惯（略同于时下所谓的潜规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凝固为习惯法。习惯法积累的过程如果遭到干扰和破坏，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形成。在此之前，谈论任何有形态的统治都没有多大意义。

任何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在感染结束以前，伤口不会愈合。用不用生肌药、用什么生肌药，影响几近于零。即使我们充分了解熬汤的所有步骤，也不可能将汤变成鱼。漂流瓶虽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满意，船员的命运却不大可能因此而改变。命运遵循人类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则，在表面的不公之下维持着神秘的公正。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自我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通常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述，边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此后的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他当时所能预料。不久，“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幽灵就走遍大地，寻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纪德高望重的诸位老神在喧嚣声中醒来，惊愕地打量这位来路不明、意图难测的新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诸神错愕之际，人间几度沧桑。幽灵修炼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华夏万千未践的遗嘱，历览五行三界、悲欢离合，渐渐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语言自有魔力，像雕刻家手中的凿子一样，劈开世界，塑造自身。每一个字都会给雕像留下一条不可逆的线条，丝毫侥幸不得。

华夏的古老经常使我们忘记，中国其实多么年轻。用梁任公的术语说，“少年中国”仍然是“新民”。她步入这个拥挤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指望海阔天空的处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险的，因为世界的表象和世界的律法形成了一对险恶的漩涡。她在最需要智慧的时刻，通常没有她所需要的语言。世界没有任何现成的语言，

能够适应她的需要。她只能一面发现世界，一面发明自己的语言。换言之：世界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她的希望与恐惧。如果镜中的形象变得陌生，她就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语言。语言是道行的体现，成熟的语言会赋予她更大的力量。当她找到适当的语言，就会发现自己适当的位置。这时，诸神的天空不再变幻莫测。在此之前，世界仍然不会给她家园的感觉。

一、条约体系与集体安全

不对称联盟与安全差序格局

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有其特殊传统，始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经过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发展到新保守主义的民主世界国际协调，直到最后一个阶段，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才真正形成。这三个阶段有一条贯穿不变的脉络：美国特殊论或美国优越论。这种理论是清教徒“山巅之城”¹理论的世俗版，以美国和世界的对照取代了天国和世界的对照。

美国和世界的对照从来不是摩尼教模式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假定善恶是对等的力量，善恶本身又是绝对的元素。“山巅之城”理论则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下游。在这种对照中，善恶是层次的差异。二者既不对等，也不绝然对立。善是完整和高级的概念，恶是残缺和低级的概念。善包容了恶，恶低于善。撒旦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上帝的手。天国是完美，世界是残缺，地狱是虚无。弃恶从善意味着从不完整走向完整，从远离上帝的位置走向接近上帝的位置。弃善从恶意味着丧失上帝的恩宠，地狱就是上

1 参《马太福音》5：14-16：“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帝恩宠所不及的地方。

美国人的祖先以“美洲的以色列人”自居，“山巅之城”构成他们认知图景的基本框架。这种（本质属于基督教的）框架体现于世俗政治，就产生了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体现于具体的安全政策，自然产生了安全差序格局。孤立主义意味着：势单力薄、道德高尚的新生合众国不能跟腐败的旧世界同流合污。门罗主义是孤立主义与地缘形势结合的自然结果。禁止旧欧洲污染新世界，意味着美洲的道德优越性可以落实为安全优越性。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在技术层面虽然表现为守势，在价值层面的自信或自大却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的任何强权。仅仅由于美国的弱小和欧洲对海外的习惯性轻视，19世纪的外交俱乐部才没有从中看出帝国的种子。

欧洲实力均衡外交的破产促成了威尔逊主义，创造了美国塑造世界秩序的第一次机会。国际联盟的原始构想明显准备以美洲共和国联盟为模板（正如美洲共和国联盟以合众国为模板），实现世界和谐。威尔逊本着“山巅之城”的前提，相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源于欧洲人的世故和猜忌。世故和猜忌达成的平衡有其内在弱点，破裂是应有之义。换句话说：美国各州的和平和繁荣是美国人道德高尚的奖品，欧洲战争和残破是欧洲人玩世不恭的惩罚。国际联盟取代实力均衡，关键不在技术和组织（美国人在这方面其实不如旧欧洲外交官擅长），而在道德更新，并且国际协调体系必须以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为基础。如果老奸巨猾的欧洲人目光短浅，不肯舍弃权术，即使美国的成功经验也挽救不了他们。

从美国孤立主义者的角度讲，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由于软件（堕落价值观）的影响，在成立以前就已经失败了。不能真心悔悟夙罪的人只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不值得拯救也无法拯救。道德落差事先决定了安全落差。从丘吉尔这样的欧洲政治家角度讲，美国人空洞而伪善的理念缺乏可操作性，只给他们带来了